



No.C2018006

2018-05-15

贸易冲击、难民危机和政治民粹主义

林雨晨 席天扬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00871

摘要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冲击和源自中东地区的难民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形成了严峻挑战。西方社会内部的反体制情绪造成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上升,扩大了政治影响。本文利用地区层面的欧洲议会选举数据,并基于2008金融危机前的贸易数据构造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贸易和难民冲击对于右翼政党得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右翼政党整体得票率随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冲击显著提高;同时,以经济议题为主的右翼政党得票率更显著地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而以文化议题为主的右翼政党得票率增加更显著地来自于难民冲击。

关键词: 贸易冲击、难民危机、右翼民粹主义、全球化

JEL: F60 D72 F16 J15

贸易冲击、难民危机和政治民粹主义

林雨晨¹ 席天扬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00871

摘要

近年来, 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冲击和源自中东地区的难民危机对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形成了严峻挑战。西方社会内部的反体制情绪造成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上升, 扩大了政治影响。本文利用地区层面的欧洲议会选举数据, 并基于 2008 金融危机前的贸易数据构造工具变量, 实证检验了贸易和难民冲击对于右翼政党得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右翼政党整体得票率随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冲击显著提高; 同时, 以经济议题为主的右翼政党得票率更显著地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 而以文化议题为主的右翼政党得票率增加更显著地来自于难民冲击。

关键词: 贸易冲击、难民危机、右翼民粹主义、全球化

JEL: F60 D72 F16 J15

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linyuchen187@163.com

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 tyxi@nsd.pku.edu.cn

1, 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事件。然而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各国总体福利和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也冲击了原有的产业和社会结构,对政府治理水平形成挑战。以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文献对于全球化冲击的认知往往聚焦发展中国家,从资源依赖、幼稚产业冲击、贫富差距和族群冲突等角度分析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成本 (Tybout 2000; Goldberg 2007)。与之相应,反全球化的声音主要来自左翼的政治力量 (Stokes, 1999; Milner and Judkins, 2004)。

但自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引发了关于全球化的新思考。新近的学术文献开始更多地讨论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进口贸易冲击对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Feenstra 2010; Autor, Dorn, and Hanson 2013; Acemoglu et al. 2016)。与之呼应,右翼民粹主义成为发达国家内部反对全球化的主要声音,并通过选举影响和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201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2016 年和 2017 年陆续举行的各国议会、总统选举中,法国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荷兰自由党、匈牙利青民盟和英国独立党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获得了可观的支持率。自 1960 年代至今,西欧的激进右翼政党在选举中的平均支持率从 5.1% 上升至 13.2%,掌握的席位比例也从 3.8% 提高至 12.8% (Inglehart & Norris 2016)。

本文利用地区层面的欧洲议会选举数据,评估全球化冲击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得票率的影响,剖析发达国家内部“反全球化”转向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文章对于全球化冲击的界定分为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在经济维度,本文主要考虑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负面影响,引发贸易

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导致以经济议题为主导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得票率上升。在文化维度，本文主要考察由于“阿拉伯之春”后来自于中东和北非动荡国家的“难民潮”涌入对于欧洲各国右翼政党得票率的影响。

经济和文化维度冲击影响的关联在于，二者在公共政策上都指向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经济维度的全球化意味着自由贸易，导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进入；文化和政治维度的全球化意味着移民开放，导致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进入，其极端形式为难民潮。从选民利益来说，来自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可能造成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冲击，使当地工人收入下降、失业率增加。难民的进入对于社会稳定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宗教观、生活方式带来冲击，容易激起民族主义情绪。西方主流建制派政治家对于贸易和难民大多抱有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也因此在这两个维度受到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集中攻击。民众对于建制派政府主导下全球化的不难乃至“疑欧”情绪的酝酿，推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竞争中赢得更大的空间。

本文采用 2014 和 2009 年两次欧洲议会选举在 NUTS-2 地区层面的政党得票率数据衡量右翼政党的政治力量。对于贸易冲击，文章基于 Autor, Dorn & Hanson (2013)，用进口商品总额按照各地区的分行业产业工人的分布数进行加权，构造地区层面的贸易冲击指数。同时，我们根据各国的难民接收数据、难民迁移的地理路线以及人口结构，建立了地区层面的难民冲击指数。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基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的 2007 年的贸易数据构造的贸易冲击指标作为其后的贸易冲击的工具变量。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经济不平等、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失业率等相关因素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冲击显著地增强了右翼政党的总体支持率。

我们进一步根据右翼政党的发展历史、意识形态、政策偏好等因素将其区分为经济议题下的右翼政党和社会文化议题下的右翼政党，并分别估计两类冲击对于这两种类型的政党得票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贸易冲击越大的地区，经济上的极右政党得票率越高，文化上的极右政党得票率越低。而在难民冲击越大的地区，两类政党的得票率呈现出相反的特征。

本文承接如下：第二节对相关文献做出评述，第三节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说，第四节介绍数据并进行描述分析，第五节讨论回归模型的设定并报告实证结果，第六节总结全文。

2, 文献概述

本文与两类文献相关。第一类文献来自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和政治冲击对于政党选举结果的影响。这一支文献关注影响选民投票倾向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可以看作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一种基于“需求侧”的分析。首先，在实证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经济景气和收入变化往往被看作影响选民投票倾向的首要因素（Brender and Drazen, 2008; Harrington, 1993; Swank, 1998），而国际贸易则通过影响收入改变选民的政党偏好。Che et al. (2016) 利用 1992 到 2010 年间美国的县级选举数据和贸易与就业数据，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于国会选举的影响，发现民主党在面临激烈进口贸易竞争的地区得票率更高，因为进口竞争而利益受损的选民，更倾向投票给主张限制进口、推动国内经济复苏的候选人。Autor et al. (2017) 基于 2016 年美国大选的数据则发现，在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竞争中，受到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更大的地区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Dippel et al. (2016) 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对德国

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发现进口冲击通过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基础效应显著增加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与此类似，Colantone & Stanig (2016) 研究了西欧 14 个国家的贸易和选举数据，也表明中国制造业出口冲击使得西欧选民在选举中更倾向于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政党。

除了贸易冲击外，外来移民的冲击亦是影响选民政党和党派偏好的重要因素。Ivarsflaten (2008) 根据欧洲社会调查 (European Social Survey) 的研究表明，对外来移民的不满是解释西欧和北欧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上升的稳健指标。Inglehart & Norris (2016) 基于同一数据的更新时段和 Arzheimer (2009) 基于欧洲晴雨表调查 (Eurobarometer) 的实证研究亦有类似发现。Halla et al. (2017)、Barone et al. (2016) 和 Otto et al. (2014) 等基于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的选举均发现移民比例的增加会导致选民更倾向于激进右翼政党。需要强调，移民冲击对选民的影响，既有经济因素，例如劳动力市场竞争、公共资源的挤占，又有文化多样性的冲击，同时人口结构变化也可能导致地区的政党偏好发生变化 (Mayda et al. 2016)。

相比之下，用“阿拉伯之春”运动后涌入欧洲各国的难民数量作为度量指标，能区分经济和文化冲击的不同渠道，也可避免由于选民结构变化导致的构成效应，这是因为难民进入就业市场的数量少，且难民无法投票。在近期文献中，Altindag & Kaushal (2017) 发现叙利亚难民涌入加剧了土耳其国内政治派别支持者之间的对立，使得执政党支持率下降。Dustmann et al. (2016) 对 1986-1998 年丹麦的难民安置的研究表明，难民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具有反移民立场的政党得票率。

和本文主旨相关的第二类文献来源于政治学，强调从选举制度和政党的竞

争策略来分析右翼政党形成机制，此类研究可以视作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一种基于“供给侧”的分析。从政党生存策略来看，右翼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包括选举规则、政党竞争模式、社会政治分层结构(political cleavage structure)等因素。二是政党自身在竞选中组织、动员、宣传等各方面的能力。三是政党如何策略性地改变政见，迎合选民情绪。近期研究认为，有些民粹型政党的政见是策略性的，为了赢得选举支持提出带有反建制色彩的主张，并不会真正转化为政策(Betz 1994; Guiso 2017)。近期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是成功运用这种策略的典范。同时传统的中右翼主流政党也可能向右转来争取选票。例如，Voorheis et al. (2015) 的利用美国的区域数据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增强了美国国内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并导致立法右翼倾向的增强。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构造地区层面的贸易和难民冲击指标，较好地区分了来自经济和文化这两个不同维度的变化对于政党竞争的影响。二是本文数据所覆盖的地区不仅包括西欧和北欧，也包括传统中、东欧地区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国家，因此本文更完整地揭示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发展。在选举数据的选择上，我们采用各地区欧洲议会的选举数据，避免了各国选举制度不同带来对于政党策略和选举结果的内生影响。欧洲议会选举往往决定未来欧盟一体化的事务，可以视为选民对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一体化和开放性政策的民意投票。因此，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较好地反映了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冲击对选民政治态度的影响。

3, 理论假说

在选举竞争模型中，政党得票率取决于选民的偏好和政党本身的政见以及意识形态（Carsey and Layman, 2006; Lee, Moretti, and Butler, 2004），而选民的偏好又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发展而变化。尽管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大多表明贸易将通过全球分工和交换提高参与国的总体福利水平(Caliendo and Parro, 2015; Melitz, 2003)，各地区和行业所受贸易冲击的福利影响不尽相同，未必带来帕累托改进。根据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OSS）以及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贸易最终会导致各国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丰裕资源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相对）稀缺资源的产品；因此贸易倾向于使丰裕要素的所有者受益，损害稀缺要素的所有者。Rogowski (1987) 基于 HOSS 和 Becker (1983) 的利益集团模型，提出国际贸易影响国内政治的两条路径。首先，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群体会进一步支持自由贸易，而从国际贸易中受损的群体会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内政治的极化现象。近二十年来美国两党政治中的极化 (polarization) 现象可以说为此机制提供了一个注脚 (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 2008)。其次，随着贸易的进程，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群体，会试图寻求把经济优势转变为政治优势，发挥更大的政策影响力，由此可能激化政党政治的冲突。基于对土地、劳动力、资本三要素模型的讨论，Rogowski 提出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的发达国家，资本拥有者会支持扩大自由贸易，而土地拥有者和劳动者会要求强化贸易保护。

上述理论较好地阐释了近年来发达国家内部围绕经济全球化议题的政治分歧。欧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资本要素相对密集，资本密集型产品是主要出口品，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则是主要进口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进

口商品冲击，使得低端制造业工人收入下降、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抵触情绪，要求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呼声高涨。因此，在劳动力密集制造业占当地劳动力比重较大的地区，对国际贸易的抵制越强，而主张去全球化的激进民粹主义得到的支持率就愈高。这些极右翼政党在其经济议题上大多主张对外的贸易保护与对内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政策相结合，在深受进口商品冲击的地区受到选民的较高支持（Colantone & Stanig 2017; Sayers & Denmark 2014; Autor et al. 2016）。

除了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导致的政治极化外，发达国家的整体增长停滞和产业衰退也可能引起选民对现状的不满，产生跨党派的反体制情绪。Samuelson (2004) 讨论了比较优势改变对于贸易格局的影响，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大幅技术赶超有可能使得发达国家在原本领先的领域丧失比较优势，减少发达国家从贸易中的获益。近期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科技产业的“贸易战”为这个理论提供了现实例证。在欧盟内部，近年来各国主流政党在经济复苏问题上应对乏力，地缘政治危机应对失当，凸显出公共治理能力的匮乏（Margalit 2011; Jensen et al. 2016）。在这种情形下，选民投票给非主流政党兼有政治问责（accountability）、选举惩戒（electoral sanction），以及对建制派施政绩效否定表达性投票（expressive voting）的意图（Barro, 1973; Costas-Perez, Sole-Olle and Sorribas-Navarro, 2012; Hillman, 2010）。而在本地产业受到贸易冲击最集中的地区，选民更倾向于把经济增长的低迷归咎于全球化的政策，转而支持本地优先、强调贸易保护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Malgouyres 2014; Dippel, Gold, and Hebllich 2015; Rodrik 2017）。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某地区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冲击越大，右翼政党在该

地区得票率越高。

正如 Betz (1994) 指出,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另一基本特征, 是对民族主义的推崇和对外来移民的极端排斥 (xenophobia), 这也是他们区别于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Jan-Werner Müller (2016) 认为, 民粹主义在本质上反对多元化的身份政治, 这决定了民粹主义政党对于外来移民的排斥。在“阿拉伯之春”后涌入欧洲的难民多数来自于中东和北非地区, 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 宗教和文化的隔阂激发了某些选民的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情绪。这就为在社会文化领域持极端立场的政党创造了政治空间。Lee, Roemer, & Straeten (2011) 建立了基于税收和文化的二维政策空间的选举竞争模型, 并利用美国、法国和丹麦的数据校准了模型均衡。其研究表明, 当中下阶层选民的排外情绪足够强烈, 他们可能在税收政策上的做出让步, 转而支持主张低税收、贸易保护和排斥移民的右翼政党。Alesina, Glaeser, & Sacerdote (2001) 的研究表明, 福利政策之所以在美国难以大规模推行, 原因在于主流选民排斥少数族裔和其他宗教群体, 不愿承担对这些群体的社会福利成本。而在近期欧洲的语境下, 相关研究表明, 难民安置占用了公共福利资源, 的确导致对难民的排斥倾向 (Schulzek 2012; Altindag & Kaushal 2017; Milanovic 2017; Vadlamannati & Kelly 2017)。从长期经济结构来说, 难民取得合法居留资格后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 增加就业竞争压力, 也是促使选民偏向极右翼政党 (Hainmueller & Hiscox 2010; Halla et al. 2017)。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 2: 某地区受到的难民冲击越大, 右翼政党在该地区的得票率越高。

4, 数据

在研究单位上, 本文选择欧盟地域统计单位命名法 (Nomenclature of Territorial Units for Statistics) 下的第二级行政区 (NUTS-2)。地域统计单位命名法是欧盟为其成员国、候选国及自由贸易国的国内行政区划设立的代号标准, 共分为三级, 绝大部分与各国的行政区划相对应。³在模型设定上, 我们将着眼于右翼政党在地区层面得票率, 因此主要的解释变量是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因素, 而非选民个体特征。此外, 考虑到民粹主义思想对极右和主流右翼政党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本文将不仅局限于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而把一般右翼政党也纳入研究对象。

4.1, 选举结果

本文采用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政党在 NUTS-2 地区层面的得票率来衡量其支持率, 对于每一个 NUTS-2 地区 i , 整理了政党 p 在该地区的得票率 vs_{ip} 。而后, 我们将每个政党的得票率与其政治立场结合, 在每一个 NUTS-2 地区 i , 对被归入右翼阵营的政党⁴得票率 vs_{ip} 进行加总, 从而得到右翼政党在该地区的得票率 vs_i , 以此作为实证分析中的被解释变量。选举数据来自各国的政府部门对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统计⁵。

基准回归采用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数据。欧洲议会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 而 2014 年的选举是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欧洲议会选举。同时,

³ 本文之所以选择第二级行政区, 是因为第一级行政区面积过大, 数量较少, 难以精确地衡量一国内不同地区的有差异的经济、社会状况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而第三级行政区虽更能体现地区之间的差异性, 但是在欧盟的统计体系下缺乏足够的研究数据, 故而我们最终选择了既能够体现地区差异、又保证较好的数据可得性的第二级行政区。不过, 由于英国和斯洛文尼亚两国的选举数据在 NUTS-2 层面无法获得, 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 以这两国的 NUTS-1 地区为研究单位。

⁴ 政党分类将在下一节进行详细介绍

⁵ 具体数据来源见附表一

受到 2010 年以来阿拉伯之春的影响，欧洲的难民危机逐渐发酵，来到欧洲的寻求避难者数量已呈激增态势。尽管欧洲议会选举被认为是“次等选举”，(second-order election)，相较于全国性的总统大选、议会选举，欧洲议会选举所关涉的政治问题重要性相对较低，但这些选举往往涉及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等议题，政党得票率更能反映选民在这些议题上的态度 (Reif & Schmitt 1980)。

4.2, 政党立场

本文选取 2014 年 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 (CHES) 的调查数据衡量欧盟各国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CHES 数据库由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欧洲各政党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进行打分，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及文化层面的多项议题，同时包含对政党在政治光谱中所处位置的综合评价。

虽然在政治上存在着主流右翼政党与极右政党的分野，然而近年来面对经济全球化、难民危机等问题，欧洲中右政党也会提出对难民采取限制或是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主张。本文首先考虑右翼政党的整体得票率，根据 CHES 数据库中的定义，政党整体的政治立场，极左为 0，极右为 10，中立为 5。因此，我们把这“lrgen”变量值大于 5 的政党定义为本文所要考察的右翼政党。同时，本文对于经济和文化议题的政党立场做出区分。采用 CHES 数据库中“lrecon”变量来衡量政党在经济议题上的政治立场，并从数据库中选取多项社会文化议题相关指标，加总后进行标准化，得到衡量政党社会文化议题立场的综合指标。⁶

⁶ 欧洲政坛上带有民粹色彩的右翼政党，可以进一步被分为两类 (Betz 1993, Betz 1994)。一类是带有较

2009 年到 2014 年，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政党所占比重显著提升，且主流中右翼政党在各项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也有极端化的趋势。本文选取 2010 年和 2014 年 CHES 数据，分别对应整理了 2009 年和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参选且获得全国得票率高于 1% 的政党在各项议题上的立场，并根据整体、经济议题、文化议题，区分了三类针对三种定义的右翼政党，并按照分值进一步分为中右政党（得分介于 5、6 之间）、右翼政党（得分介于 6、8 之间）、和极右政党（得分大于 8）三组。表 1 反映了各类政党在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突破全国 1% 的数量，以及百分数表示的各类政党在地区层面的平均得票率。可以看出，大部分类别的右翼政党总数有所增加，其中极右政党数量增加的最多，且平均得票率有显著提高。

表 1 各类政党数量、平均得票率变化

	2009 年		2014 年	
考虑全部议题的分类				
左翼政党	75	41.98%	87	41.97%
中右政党	23	9.32%	24	7.90%
右翼政党	52	39.18%	66	35.26%
极右政党	17	6.12%	23	10.12%
仅考虑经济议题的分类				
左翼政党	86	45.35%	102	48.45%
中右政党	30	19.33%	27	15.60%
右翼政党	42	26.78%	53	26.5%
极右政党	9	5.13%	18	6.22%
仅考虑文化议题的分类				

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右翼民粹政党 (nativist populist radical right)，例如法国国民阵线，这一类政党目前通过调整过于极端的右翼言论以期在选举中获得更多席位、进入主流政坛，其政策的重点在于社会文化政策上强调身份认同、反对外来移民；另一类则是从主流政党发展而来的新自由主义右翼民粹政党 (neoliberal populist parties)，例如英国独立党 (UKIP)、意大利力量党 (Forza Italia)，这一类政党相对更强调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同时受全球化冲击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同时也逐渐带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的特征。

左翼政党	92	50.08%	113	53.51%
中右政党	15	7.35%	13	1.74%
右翼政党	45	34.04%	51	28.49%
极右政党	15	5.13%	23	11.51%
合计	167		200	

4.3, 贸易冲击

本文采用 Autor, Dorn & Hanson (2013) 提出的“人均进口冲击”指数 (impact-per-worker, IPW) 来衡量地区受到经济全球化贸易冲击的程度:

$$IPW_i = \sum_k \frac{L_{ik}}{L_i} * \frac{IM_{ck}}{L_{ck}}$$

其中, c 代表国家, i 代表 NUTS-2 地区, k 代表在欧洲经济活动分类法 2.0 版本 (NACE Rev.2) 下, C 类即制造业下属的各个行业。 IM_{ck} 是在一段时期内国家 c 在行业 k 上的进口额变动值。我们关注的主要是来自劳动密集型国家的制造业贸易冲击, 因此分别选择了 2014 年联合国定义的 107 个发展中国家、根据 Bernard et al. (2006) 和 Auer et al. (2010) 关于低工资国家的定义选取的 9 个代表性低工资国家⁷、中国和金砖四国对欧盟各国的进口额变动值。由于 2014 年之前的一次欧洲议会选举在 2009 年举行, 故选取 2010 年和 2014 年的进口额之差衡量进口额变动。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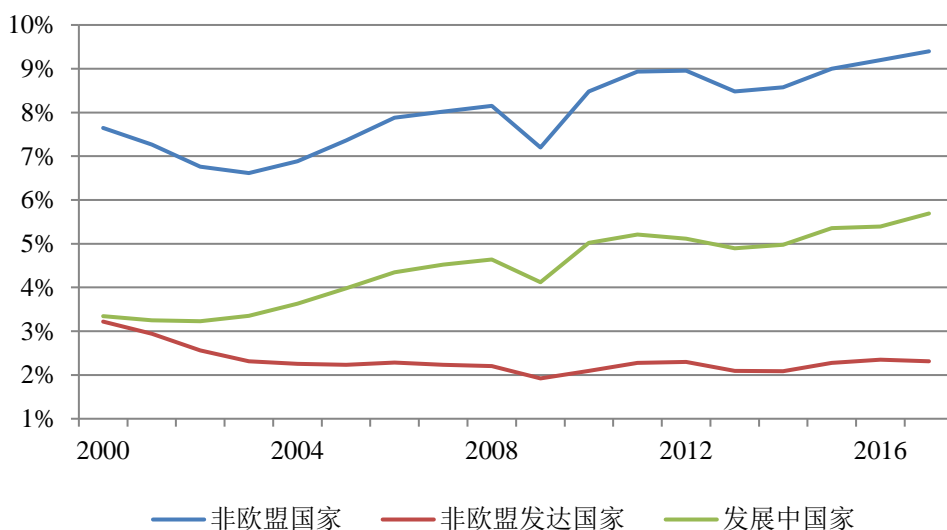
L_{ck} 是 2010 年国家 c 在行业 k 的就业总人数, 即采用一国在该行业的就业总人数对该行业的进口变动额进行标准化。考虑到地区间的贸易冲击差异, 对标准化后的贸易冲击进行了加权, 权重为 2010 年地区 i 在行业 k 的就业人数 L_{ik}

⁷ 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⁸ 此外, 2008 年后欧盟实行新的经济活动分类法, 即从 NACE Rev.1.1 版本改进为 NACE Rev. 2 版本, 在制造业的具体分类上有诸多调整, 而各国在统计口径上直到 2010 年才基本完成改动, 因此选取 2010 年的数据, 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潜在的测量误差。

占 2010 年该地区就业总人数 L_i 的比值,从而通过就业人数比重反映中行业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上不同的重要性。最后,对各行业的贸易冲击进行加总,得出该地区整体贸易冲击。计算中所采用的贸易、就业数据均来自欧盟下设的欧洲统计局⁹。这一指标反映了地区受到外来贸易冲击的程度与该地区的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某一地区就业集中的行业是本国进口贸易较为发达的行业,那么该地区受到贸易冲击的程度就相对更大。

图 1 反映了本世纪以来,欧盟 28 国来自非欧盟国家、发展中国家和非欧盟发达国家制造业进口占 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来自非欧盟国家的进口占 GDP 比重整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进口贸易额占欧盟 GDP 比重已从 3% 上升至接近 6%。在附录中,我们展示了欧盟 28 国对代表性低工资国家的进口贸易分布,发现进口集中在电子产品、电器、机械设备、服装及皮革制品等行业,对欧盟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造成了较为强烈的冲击。



注:数据来自欧洲统计局 (Eurostat)

图 1 欧盟外进口占 GDP 比重变化

⁹ 缺失的就业数据按照经济增长率进行插补。

4.4, 难民冲击

由于目前欧洲统计局仅有国家层面的庇护申请者数据, 我们结合地理数据和历史移民数据建立地区层面的难民冲击代理变量。地理距离为每一个 NUTS-2 地区 i 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与距其最近的难民中转城市之间的距离 $distance_i$, 历史移民数据来自欧洲统计局 2011 年普查数据中各 NUTS-2 地区的总人口 POP_i 和出生在国外的居民总数 FOR_i 。基于引力模型的思想, 我们构建了地区层面的难民冲击 ($Asylumproxy_i$) 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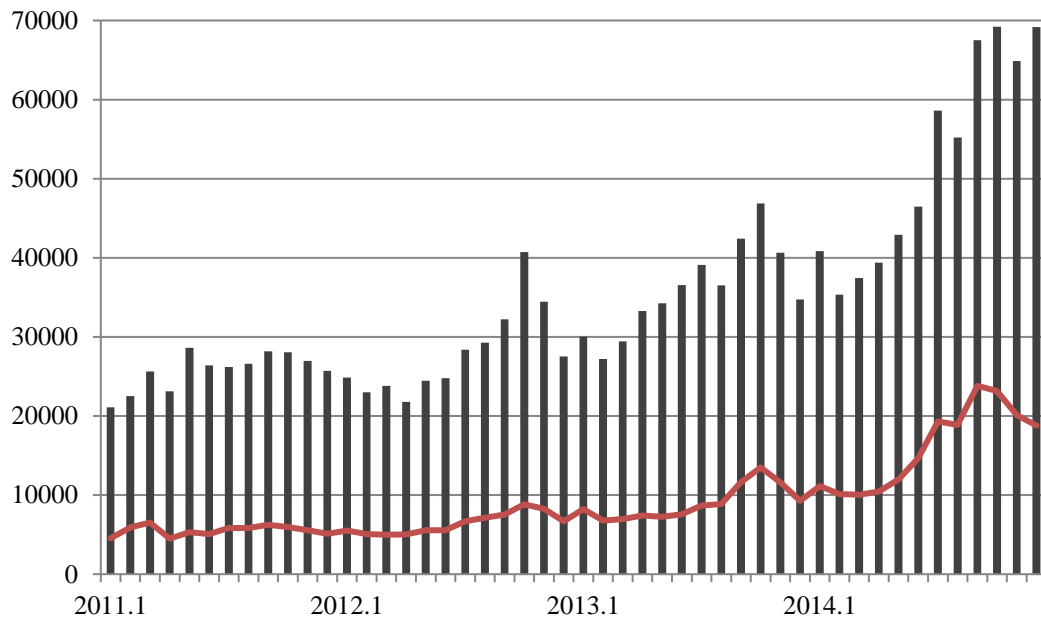
$$Asylumproxy_i = \frac{AsylumN_c}{\log(dis_i)} * \frac{FOR_i}{POP_i}$$

在建立地区层面的代理变量时, 我们主要考虑地理因素和历史移民数据对于难民分布的影响。欧洲国际边界管理署 (Frontex) 划分了八个难民进入欧洲的主要路线。其中, 北非、中东的难民最常使用、同时也是人流量最大的路线是中地中海路线、东地中海路线和西巴尔干路线, 难民从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后, 大多会沿交通线继续北上, 前往经济更为发达、福利水平更高的西北欧各国。因此难民最为集中的安置区域, 除了地中海沿岸的几大港口城市, 便是重要交通线特别是铁路沿线的城市地区。结合欧洲境内的主要交通线, 本文由此得到难民进入欧洲的大致路线, 并根据相关研究报告选择了 16 个位于重要交通线上、且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主要难民中转城市¹⁰。另一方面, 难民在选择安置地区时, 除了考虑交通通达度之外, 也会倾向于选择居民中移民比例较高、对移民有较高包容性的地区。因此本文选取了欧洲统计局最新一次的普查数据, 即 2011 年 NUTS-2 地区出生在国外的居民比例, 来反映在本轮难民潮之前地区层面的移民情况, 以进一步刻画该地区在文化族群多样性上对难民安

¹⁰ 中转城市列表见附表二。

置的吸引力。

图 2 展示了 2011 年至 2014 年间欧洲统计局在册的庇护申请者总数的变化趋势，其中的红线是来自中东、北非地区的难民比例。可以看出，自 2012 年年初开始，欧洲难民数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自 2014 年起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来自北非、中东地区的难民数量增长尤为迅速，从 2014 年开始增速加快。



注：数据来自欧洲统计局 (Eurostat)

图 2 2011-2014 年欧盟 28 国难民数量变化趋势

下文的图 3 和图 4 分别展示了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政党得票率，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以及难民冲击在 NUTS-2 地区上的分布情况。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右翼政党得票率与人均贸易冲击在 NUTS-2 地区的分布状况有着较高的相似度，难民冲击则在西北欧地区与右翼政党得票率的分布较为接近。右翼政党得票率和贸易、难民冲击的地理分布模式与第三节中讨论的理论假说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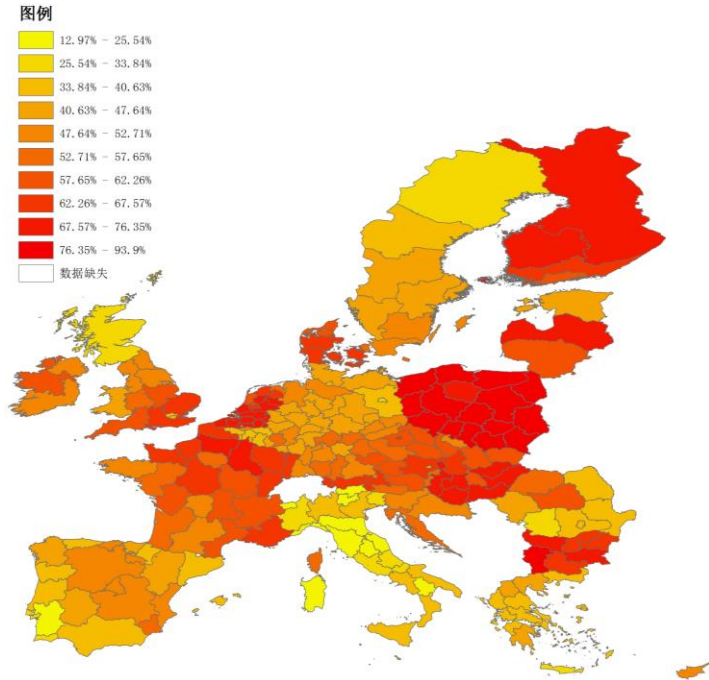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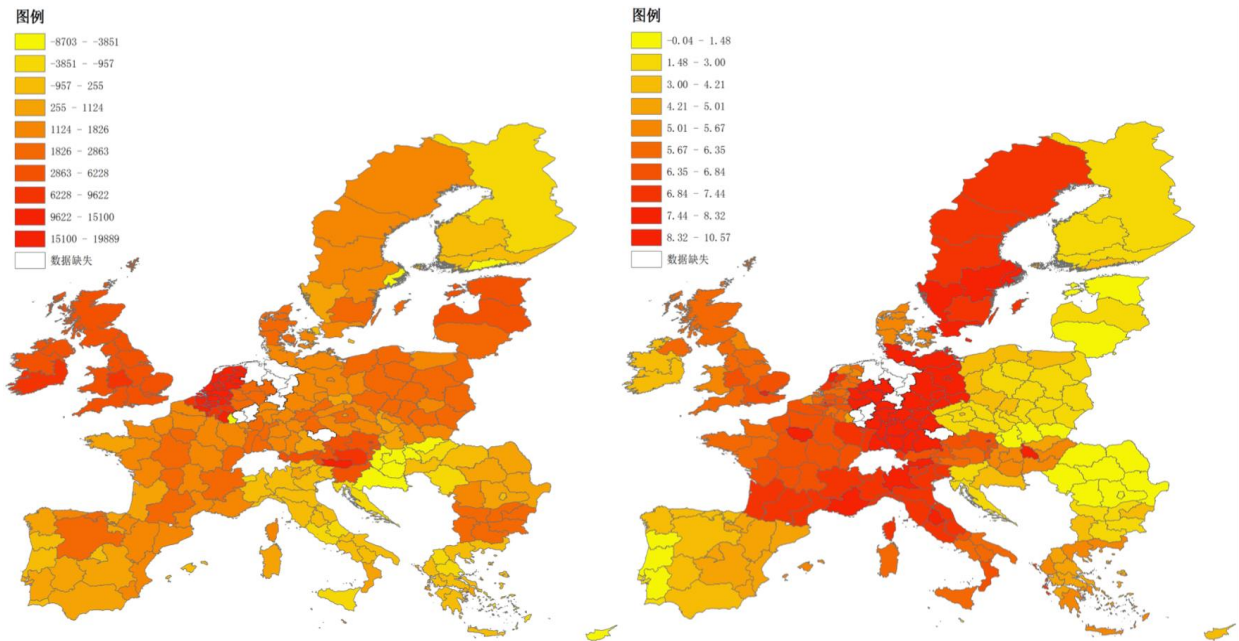


图 3 2014 欧洲议会选举右翼政党得票率分布



注：左图中人均贸易冲击以欧元计算

图 4 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左）与难民冲击（右）

4.5, 控制变量

除衡量贸易冲击、难民冲击的两个关键解释变量之外,我们从欧洲统计局数据库中收集了2014年NUTS-2地区层面的人口、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失业率等经济社会数据,在国家层面收集了基尼系数,以在实证分析中作为控制变量。表2给出了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 2 解释变量、控制变量数据描述

变量名称	单位	观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万欧元/人	227	1.989	-0.8703	0.2628	0.4766
低工资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万欧元/人	227	1.7968	-0.5063	0.1898	0.3597
中国人均贸易冲击	万欧元/人	227	1.5317	-1.5761	0.1013	0.2964
金砖四国人均贸易冲击	万欧元/人	227	1.5257	-1.5831	0.1185	.3053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1}	226	10.57	-0.04	5.48	2.35
人口	人	227	12014814	28666	2148318	1858364
人均生产总值	欧元	227	87600	3800	25581.50	13247.67
可支配收入	欧元	224	26000	2900	14653.13	6118.50
失业率	[0,1]	227	0.35	0.03	0.11	0.06
基尼系数	[0,1]	28	0.36	0.25	0.30	0.03

注:数据均来自欧洲统计局

5. 实证分析

5.1, 基准回归

本文就贸易冲击、难民冲击与右翼政党得票率建立基准模型如下:

$$VoteShare_i = \beta_0 + \beta_1 IPW_i + \beta_2 AylumProxy_i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其中 i 代表研究单位 NUTS-2 地区 i , $VoteShare_i$ 为地区右翼政党总得票率, IPW_i 为地区人均贸易冲击, $AylumProxy_i$ 为地区难民冲击。 X_i 为一组控制变量,

包括人口、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失业率和基尼系数， ε_i 为误差项。

回归分析中人口、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取自然对数形式。

表 3 报告了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从 2010 年到 2014 年，制造业工人人均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贸易冲击每增加 1 万欧元，该地区右翼政党得票率上升 6.15 个百分点。分别按照来自代表性低工资国家、中国和金砖四国的贸易冲击估算，也得到了相近的估计结果，而难民冲击对右翼政党得票率在基准回归中没有显著影响。除贸易之外的其他经济指标对右翼政党得票率也有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1%，右翼政党得票率减少 0.15%；失业率上升 1 个百分点，右翼政党得票率下降 0.5 个百分点；基尼系数上升 0.1，右翼政党得票率下降 20 个百分点。

结果表明，欧盟各国由于在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较强的进口冲击。经济利益受损的制造业从业者更倾向于支持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维护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右翼政党。而就右翼政党整体得票率而言，难民冲击尚未带来显著影响。

控制变量中还有两个结果值得注意。一是可支配收入与右翼政党得票率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支配收入提高带来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的思想文化更加开放多元，选民在政治上更偏好欧洲一体化，经济上希望增加社会福利，因而反对较为激进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二是基尼系数、失业率与右翼政党得票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地区内失业与经济不平等问题越严重，右翼政党得票率越低。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右翼政党多反对收入再分配政策，不赞成提高税负，故而在收入差距大、失业人口多的地区，选民更倾向于投票给支持福利的左翼政党或中间派政党。

表 3 贸易冲击、难民冲击对右翼政党得票率影响

	(1)	(2)	(3)	(4)
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615*** (0.0178)			
低工资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905*** (0.0215)		
中国人均贸易冲击			0.1198*** (0.0257)	
金砖四国人均贸易冲击				0.1255*** (0.0269)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045 (0.0057)	-0.0047 (0.0057)	-0.0039 (0.0056)	-0.0039 (0.0057)
人口	0.0145 (0.0148)	0.0139 (0.0148)	0.0133 (0.0144)	0.0132 (0.0146)
人均 GDP	0.0045 (0.0527)	0.0008 (0.0497)	-0.0030 (0.0477)	-0.0049 (0.0496)
可支配收入	-0.1505*** (0.0557)	-0.1477*** (0.0525)	-0.1428*** (0.0505)	-0.1423*** (0.0522)
失业率	-0.5555*** (0.1648)	-0.5364*** (0.1599)	-0.5319*** (0.1577)	-0.5458*** (0.1595)
基尼系数	-1.9182*** (0.4134)	-1.9250*** (0.4119)	-1.9871*** (0.4093)	-1.8910*** (0.4085)
常数项	2.3611*** (0.2648)	2.3801*** (0.2592)	2.3983*** (0.2589)	2.3828*** (0.2593)
观测值个数	223	223	223	223
R^2	0.4024	0.4086	0.4115	0.415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5.2, 工具变量

基准模型中我们使用 2010-2014 年贸易额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来衡量贸易冲击。采用这一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是，在一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的地区，民粹主义思想更易被接纳，使得民众倾向于选择右翼政党，而这些地区受到贸易冲击的负面影响往往也强于经济发达地区。为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计算了 2003 年至 2007 年进口贸易额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作为工具变量。我们定义 2007 年人均贸易冲击为：

$$IPW07_i = \sum_k \frac{L_{ik}}{L_i} * \frac{IM_{ck}}{L_{ck}}$$

其中， k 代表在欧洲经济活动分类法 1.1 版本（NACE Rev.1.1）下，D 类即制造业下属的各个行业， IM_{ck} 为 2003 年与 2007 年国家 c 在行业 k 的进口额之差，选择这一时段主要考虑到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对外经济都带来了较大的冲击，2008、2009 年欧洲的进出口贸易都有明显的下降，难以较好地反映进口冲击对工人群体的影响¹¹。 L_{ck} 、 L_{ik} 、 L_i 分别是 2007 年国家 c 在行业 k 的就业总人数、地区 i 在行业 k 的就业人数、地区 i 就业总人数。与前文类似，我们分别计算了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低工资国家、中国和金砖四国的人均贸易冲击。

工具变量法的一阶段回归模型设置如下：

$$IPW_i = \delta_0 + \delta_1 IPW07_i + \gamma Z_i + \mu_i$$

其中， Z_i 包含了难民冲击代理变量（*AylumProxy_i*）和基准模型中所有的控制变量，表 4 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一阶段回归的 Kleibergen-Paap 检验得到 F 统计值数值较大，倾向于支持不存在严重的弱工具变量问题。二阶段回归表明，将 2003-2007 年人均贸易冲击作为工具变量后，得到的估计结果在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上都与基准模型较为接近。按照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一个 NUTS-2 地区制造业工人人均受到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冲击增加 1 万欧元，

¹¹ 此外，欧洲经济活动分类法（NACE）在 2008 年进行了修订，此前一直使用 NACE 1.1 版本，因此选取 2008 年修订之前的数据，可以避免因工业活动分类变化而带来的测量误差问题。

右翼政党得票率会增加 5.1 个百分点，按照代表性低工资国家、中国和金砖四国的人均贸易冲击估算，则人均贸易冲击增加 1 万欧元将导致右翼政党得票率增加 7 至 9 个百分点。

表 4 贸易冲击、难民冲击对右翼政党得票率影响 - 工具变量结果

	(1)	(2)	(3)	(4)
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510** (0.0252)			
低工资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779*** (0.0301)		
中国人均贸易冲击			0.0968*** (0.0347)	
金砖四国人均贸易冲击				0.0869** (0.0363)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021 (0.0062)	-0.0021 (0.0060)	-0.0017 (0.0060)	-0.0019 (0.0060)
人口	0.0161 (0.0152)	0.0157 (0.0152)	0.0150 (0.0148)	0.0150 (0.0148)
人均 GDP	-0.0040 (0.0577)	-0.0091 (0.0551)	-0.0083 (0.0533)	-0.0060 (0.0551)
可支配收入	-0.1522*** (0.0580)	-0.1489*** (0.0553)	-0.1472*** (0.0541)	-0.1491*** (0.0558)
失业率	-0.5384*** (0.1631)	-0.5220*** (0.1591)	-0.5203*** (0.1574)	-0.5327*** (0.1589)
基尼系数	-1.9512*** (0.4366)	-1.9462*** (0.4234)	-2.0119*** (0.4165)	-1.9681*** (0.4238)
常数项	2.4339*** (0.2551)	2.4550*** (0.2492)	2.4630*** (0.2486)	2.4459*** (0.2511)
观测值个数	213	213	213	213

一阶段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2014 年人均贸易冲击

2007 年人均贸易冲击	0.3790*** (0.0256)	0.3311*** (0.0338)	0.3459*** (0.0381)	0.3055*** (0.0314)
Kleibergen-Paap F 统计值	218.276	96.050	82.368	94.987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5.3, 极端右翼政党

根据上文中对极右翼政党的分类，本文专门研究了贸易冲击、难民冲击对不同类型的极端右翼政党潜在的差异性影响，得到回归结果表 5、表 6。我们发现，贸易冲击与难民冲击对两类极右政党的得票率表现出完全相反的作用。

对于经济极右政党，人均贸易冲击增加 1 万欧元使得票率增加约 7 至 11 个百分点，难民冲击增加 1 单位导致得票率下降 1 个百分点左右。经济全球化令欧盟各国资本要素拥有者受益，其政治影响力随着财富的增长上升，而传统制造业的产业工人群体的利益受损。相比之下，以经济议题为主极右政党在社会文化政策上并无极端的民粹主义主张，难民冲击的增强并不会改变选民对这一类政党的政治偏好。

就文化极右政党而言，人均贸易冲击增加 1 万欧元导致得票率下降约 10 至 16 个百分点，难民冲击增加 1 单位使得票率增加约 3.5 个百分点。面对难民对社会福利的挤占、对社会治安的影响，乃至对于欧洲主流传统文化的冲击，该地区选民的排外情绪增加，转变为对于文化持保守主义和对于移民、难民政策持排斥态度的极右政党的支持。这些文化上倾向于极右的政党，在经济政策相对温和，所以贸易冲击对于其选举得票率的影响有限。

表 5 贸易冲击、难民冲击对经济议题下的极右政党得票率影响

	(1)	(2)	(3)	(4)
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782***			

	(0.0144)			
低工资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964***		
		(0.0249)		
中国人均贸易冲击			0.1031***	
			(0.0290)	
金砖四国人均贸易冲击				0.1146***
				(0.0294)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103***	-0.0109***	-0.0108***	-0.0104***
	(0.0032)	(0.0032)	(0.0030)	(0.0031)
控制变量	√	√	√	√
观测值个数	213	213	213	213
R ²	0.3207	0.2479	0.2523	0.2950

注：本表中的回归均为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结果，一阶段 K-PF 统计值均大于 10。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6 贸易冲击、难民冲击对文化议题下的极右政党得票率影响

	(1)	(2)	(3)	(4)
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1025***			
	(0.0176)			
低工资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1372***		
		(0.0269)		
中国人均贸易冲击			-0.1444***	
			(0.0294)	
金砖四国人均贸易冲击				-0.1660***
				(0.0321)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348***	0.0352***	0.0351***	0.0345***
	(0.0071)	(0.0073)	(0.0075)	(0.0073)
控制变量	√	√	√	√
观测值个数	213	213	213	213
R ²	0.3341	0.2819	0.2893	0.2936

注：本表中的回归均为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结果，一阶段 K-PF 统计值均大于 10。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5.4, 得票率的动态变化

近年来欧洲政坛右翼政党、特别是极右政党支持率的上升趋势，主要是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出现。本文利用 2009 年 NUTS-2 地区层面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计算从 2009 年 2014 年的两次欧洲议会选举之间，右翼政党和两类极右政党在 NUTS-2 层面的得票率变化，进一步研究贸易冲击和难民冲击对于右翼势力得票率的动态影像。

表 7 贸易冲击、难民冲击对各类政党得票率变化的影响

	右翼政党	经济极右政党	文化极右政党
发展中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522*** (0.0164)	0.0585*** (0.0188)	-0.0810*** (0.0148)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042 (0.0044)	-0.0048 (0.0040)	0.0309*** (0.0061)
低工资国家人均贸易冲击	0.0865*** (0.0232)	0.0514** (0.0237)	-0.0909*** (0.0212)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040 (0.0043)	-0.0057 (0.0038)	0.0317*** (0.0064)
中国人均贸易冲击	0.1044*** (0.0277)	0.0458* (0.0257)	-0.0834*** (0.0216)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036 (0.0043)	-0.0059 (0.0038)	0.0319*** (0.0067)
金砖四国人均贸易冲击	0.0973*** (0.0268)	0.0605** (0.0283)	-0.1103*** (0.0257)
难民冲击代理变量	-0.0037 (0.0043)	-0.0055 (0.0038)	0.0312*** (0.0064)

注：本表中，每项贸易冲击和该项下一行的难民冲击为一组回归结果，对应于三类不同的被解释变量（右翼政党得票率变化、经济极右政党得票率变化、文化极右政党得票率变化），均为工具变量二阶段回归结果，一阶段 K-P F 统计值均大于 10。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7 综合报告了以三类右翼政党的得票率在 2014 到 2009 年之间变化为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四种贸易冲击的度量指标和难民冲击作为被解释变量所得到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对于右翼政党整体而言，贸易冲击越大的地区，得票率增加越多，这一趋势也体现在经济上的极右政党中，但难民冲击对于整体右翼政党和经济上的极右政党则没有显著的影响。就文化上的极右政党而言，贸易冲击越大的地区，得票率增加得越少，而难民冲击越大的地区，得票率增加得越多。这一系列结果说明，2009 年以来，右翼政党和极右政党的得票率增加主要根源于贸易冲击的增强，与此同时，难民冲击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极右政党得票率增加。

6, 结论

本文利用欧洲议会选举中地区层面的政党得票率数据，实证研究了欧洲社会所受到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冲击和中东难民冲击对于右翼政党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发展中国家、低工资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进口贸易冲击显著提升了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基础回归的结果与利用历史上的贸易冲击作为工具变量回归，以及利用 2009 年到 2014 年两次欧洲议会选举的得票率变化为被解释变量所得到的结果保持一致。同时，研究发现贸易冲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经济议题为主的极右翼政党，难民冲击的影响则对于以文化议题为主的极右翼政党更加显著。

本文的发现具有两点启示。首先，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各国经济增长和总体福利水平增加的同时，在国家内部可能造成结构性冲击，加剧收入和经济机会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进入全球市场，既增进了全世界的总

体产出和全体消费者的福利，也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形成竞争，对于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带来不利的冲击。随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加入全球产业链，对于高收入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经济冲击将是长期的和结构性的，这也意味着本文实证发现所揭示的西方社会内部的政治极化现象和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将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正如 Dani Rodrik 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提出，经济全球化、政策自主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如果欧洲各国希望能够维护代议制民主下各个利益集团的诉求，对受损群体实行保护，同时保持对外贸易事务上的自主权，那么就必须对本国经济开放度加以限制。在今天国际贸易和经济争端频发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到这种趋势的长期性和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对于帮助我国理解和应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对华经贸政策的转向有一定现实意义。

其次，本文的发现也表明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发展并不是一个不断走向开放多元和自由包容的线性过程。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在欧洲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早期全球化下结构性冲击的产物。近年来西方国家的经济低迷、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移民对于主流社会价值观造成的冲击，使得极端右翼政治力量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并带来保守化和封闭化的政策调整取向。政治民粹主义的崛起往往以底层民众对于现状和精英的不满为前提，其政策主张又往往以民主之名行封闭排外之实，这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完善带来了更深层的挑战。

附录

附表一 各国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数据来源

国家	数据来源
奥地利	奥地利内政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es
比利时	比利时选举局 Direction des Elections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 Централна избирателна комисия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内政部 ΥΠΟΥΡΓΕΙΟ ΕΣΩΤΕΡΙΚΩΝ
捷克	捷克统计局 Český Statistický Úřad
德国	德国联邦选举局 Der Bundeswahlleiter
丹麦	丹麦统计局 Danmarks Statistik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国家选举委员会 Valimised
希腊	希腊内政部 Υπουργείο Εσωτερικών
西班牙	西班牙内政部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芬兰	芬兰司法部 Oikeusministeriö
法国	法国内政部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匈牙利	匈牙利全国选举办公室 Nemzeti Választási Iroda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全国选举委员会 Državnog Izbornog Povjerenstva
爱尔兰	爱尔兰选举网 Election Ireland
意大利	意大利内政部 Ministero dell'Interno
立陶宛	欧洲议会 European Parliament
卢森堡	卢森堡政府 Le Gouvernement du Grand-Duché de Luxembourg
拉脱维亚	欧洲议会 European Parliament
马耳他	欧洲议会 European Parliament
荷兰	荷兰选举委员会 Kiesraad
波兰	波兰全国选举委员会 Państwowa Komisja Wyborcza
葡萄牙	葡萄牙内政部 Ministério da Administração Interna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中央选举局 Biroul Electoral Central
瑞典	瑞典全国选举局 Valmyndigheten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 Državna Volilna Komisija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统计局 Statistický Úřad Slovenskej Republiky
英国	英国议会 UK Parliament

附表二 欧盟 28 国对代表性低工资国家贸易情况

制造业分类 (NACE Rev.2)	2010-2016 进口额变动 (亿欧元)	2016 年 进口额占比	2010-16 净出口额变动 (亿欧元)	2016 年 净出口额 (亿欧元)	2010-2016 进口额平均增 长率
食品	33.55	4.31%	0.86	-0.0035	4.06%
饮料	0.95	0.08%	0.33	0.41	6.82%
烟草制品	0.19	0.02%	0.12	0.30	4.69%
纺织品	31.02	2.55%	-0.20	-0.06	7.90%
服装	9.46	7.48%	0.20	-0.96	2.17%
皮革及皮革制品	55.30	4.68%	-0.49	-0.46	6.57%
木材、软木及木制品	-0.60	0.78%	0.25	0.21	2.70%
纸及纸制品	6.97	0.92%	0.15	0.29	8.09%
印刷品及录制品	0.15	0.01%	0.11	0.30	7.12%
焦煤及精炼石油制品	-26.80	0.51%	0.41	0.33	3.20%
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59.12	3.96%	0.42	0.60	10.33%
药品及药物制剂	15.10	1.32%	1.04	0.66	9.55%
橡胶及塑料制品	57.37	3.20%	-0.35	-0.03	10.74%
其他非金属制品	5.78	1.30%	0.13	0.17	5.62%
碱性金属	35.70	2.63%	-0.58	0.17	15.09%
金属制品	64.80	3.70%	-0.40	-0.07	9.73%
电脑，电子及光学设 备	294.85	29.32%	-2.79	-3.94	8.49%
电气设备	167.13	8.86%	-1.48	-0.58	11.84%
其他机械设备	110.90	6.86%	-1.03	0.92	9.71%
道路车辆	40.96	2.42%	1.58	1.33	8.90%
其他运输设备	-30.56	1.91%	2.20	0.87	9.19%
家具	14.71	2.08%	0.02	-0.01	6.00%
其他工业制成品	72.62	5.60%	-0.52	-0.46	7.68%
合计：制造业产品	1018.67	94.50%	-194.66	-2066	7.74%

附表三 欧洲难民迁移的主要中转城市

国家	城市	国家	城市
意大利	墨西拿 Messina	德国	汉堡 Hamburg
意大利	罗马 Rome	德国	法兰克福 Frankfurt
意大利	米兰 Milan	德国	慕尼黑 Munich
法国	巴黎 Paris	奥地利	维也纳 Vienna
比利时	布鲁塞尔 Brussels	匈牙利	布达佩斯 Budapest
荷兰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 Zagreb
丹麦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 Belgrade
瑞典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希腊	雅典 Athens

参考文献

- Altindag, Onur and Kaushal, Neeraj, Do Refugees Impact Voting Behavior in the Host Country? Evidence from Syrian Refugee Inflows in Turkey,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0849, 2017.
- Arzheimer, Kai. "Contextual factors and the extreme right vote in Western Europe, 1980–2002."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 no. 2 (2009): 259-275.
- Auer, Raphael, and Andreas M. Fischer. "The effect of low-wage import competition on US inflationary pressur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7, no. 4 (2010): 491-503.
- Autor, David,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no. 6 (2013): 2121-68.
- Autor, David, David Dorn, Gordon Hanson and Kaveh Majlesi. 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No. w2263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
- Barone, Guglielmo, Alessio D'Ignazio, Guido de Blasio, and Paolo Naticchioni. "Mr. Rossi, Mr. Hu and politics. The role of immigration in shaping natives' vo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36 (2016): 1-13.
- Barro, Robert. 1973. "The control of politicians: An economic model." *Public Choice*. 14(1): 19-42.
- Bernard, Andrew B., J. Bradford Jensen, and Peter K. Schott. "Survival of the best fit: Exposure to low-wage countries and the (uneven) growth of US manufacturing pla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 no. 1 (2006): 219-237.
- Betz, Hans-Georg. "The two facts of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Review of Politics* 55, no. 4 (1993): 663-85.
- Betz, Hans-Georg.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Springer, 1994.
- Bowler, Shaun, David Denemark, Todd Donovan, and Duncan McDonnell. "Right-wing populist party supporters: Dissatisfied but not direct democra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6, no. 1 (2017): 70-91.
- Brender, Adi, and Allan Drazen. 2008. "How do budget deficits and economic growth affect reelection prospects? Evidence from a large panel of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5): 2203-2220.
- Burgoon, Brian. "Partisan embedding of liberalism: How trade, investment, and immigration affect party support for the welfare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5, no. 5 (2012):

606-635.

Caliendo Lorenzo and Fernando Parro. 2015. "Estimates of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NAFTA."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2(1): 1-44.

Carsey, Thomas, and Geoffrey Layman. 2006. "Changing Sides or Changing Minds?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olicy Preference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2): 464-477.

Che, Yi, Yi Lu, Justin R. Pierce, Peter K. Schott, and Zhigang Tao. Does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China Influence US Elections?. No. w2217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

Colantone, Italo, and Piero Stanig. Global Competition and Brexit, BAFFI CAREFIN Centre Research Paper No. 2016-44, 2016.

Colantone, Italo, and Piero Stanig. The Trade Origins of Nationalist Protectionism: Import Competi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Western Europe. Mimeo, Bocconi University, 2016.

Costas-Perez, Elena, Sole-Olle, Albert and Pilar Sorribas-Navarro. 2012. "Corruption scandals, voter inform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8(4): 469-484.

Dippel, Christian, Robert Gold, and Stephan Heblich.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 content: Trade shocks and voting behavior. No. w2181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5.

Dustmann, Christian, Kristine Vasiljeva, and Anna Piil Damm. "Refugee migration and electoral outcomes." *CReAM DP 19 (2016)*: 16.

Europol, Migrant Smuggling in the EU. <https://www.europol.europa.eu/publications-documents/migrant-smuggling-in-eu>. 2017-01-16

Frieden, Jeffrey A. 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06.

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4. <http://frontex.europa.eu/publications/?c=risk-analysis>. 2017-01-16

Frontex, Annual Risk Analysis, 2015. <http://frontex.europa.eu/publications/?c=risk-analysis>. 2017-01-16

Golder, Matt. "Far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2016): 477-497.

Guiso, Luigi, Helios Herrera, Massimo Morelli, and Tommaso Sonno. Demand and supply of populism.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2017.

Hainmueller, Jens, and Michael J. Hiscox. "Attitudes toward highly skilled and low-skilled immigr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4, no.

1 (2010): 61-84.

Halla, Martin, Alexander F. Wagner, and Josef Zweimüller. "Immigration and voting for the far right."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5, no. 6 (2017): 1341-1385.

Harrington, Joseph. 1993. "Economic Policy,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Elec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1): 27-42.

Hillman, Arye. 2010. "Expressive behavior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6 (4): 403-418.

Inglehart, Ronald, and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2016).

Ivarsflaten, Elisabeth. "What unites right-wing populists in Western Europe? Re-examining grievance mobilization models in seven successful cas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 no. 1(2008): 3-23.

Jensen, J. Bradford, Dennis P. Quinn, and Stephen Weymouth. "Winners and loser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effects on US presidential vot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1, no. 3 (2017): 423-457.

Lee, David, Moretti, Enrico, and Matthew Butler. 2004. "Do Voters Affect or Elect Policies? Evidence from the U. S. Hous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3): 807-859.

Lefort, Claude.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Lucassen, Geertje, and Marcel Lubbers. "Who fears what? Explaining far-right-wing preference in Europe by distinguishing perceived cultural and economic ethnic threa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5, no. 5 (2012): 547-574.

Margalit, Yotam. "Costly jobs: Trade-related layoffs, government compensation, and voting in US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 no. 1 (2011): 166-188.

Malgouyres, Clement. *Trade shocks and far-right voting: Evidence from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s*. EUI Working Paper RSCAS 2017/21,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17.

Mayda, Anna Maria, Giovanni Peri, and Walter Steingress. *Immigration to the U.S.: A Problem for the Republicans or the Democrats?*. No. w2194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

Mayer, Nonna. "From Jean-Marie to Marine Le Pen: electoral change on the far right." *Parliamentary Affairs* 66, no. 1 (2013): 160-178.

Melitz, Marc.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 - 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6): 1695-1725.

Milner, Helen, and Benjamin Judkins. 2004. "Partisanship, Trade Policy, and Globalization: Is

There a Left–Right Divide on Trade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8(1): 95-119.

Mudde, Cas. "Three decades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So wha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2, no. 1 (2013): 1-19.

Mudde, Cas. *The ideology of the extreme righ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0.

Mudde, Cas.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Mudde, Cas.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 no. 4 (2004): 541-563.

Muller, Jan-Werner. *What Is Popu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Oesch, Daniel. "Explaining Workers' Support for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Evidence from Austria, Belgium, France, Norway, and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9, no. 3 (2008): 349-373.

Otto, Alkis Henri, and Max Friedrich Steinhardt. "Immigration and election outcomes—Evidence from city districts in Hamburg."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45 (2014): 67-79.

Reif, Karlheinz, and Hermann Schmitt. "Nine second-order national election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European Election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8, no. 1 (1980): 3-44.

Rodrik, Dani.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No. w2355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

Rodrik, Dani.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why global markets, states, and democracy can't coexi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Rogowski, Ronald.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changing exposure to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no. 04 (1987): 1121-1137.

Rogowski, Ronald. "Trade and the variet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no. 02 (1987): 203-223.

Samuelson, Paul. 2004.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 (3): 135-146.

Sayers, Anthony Michael, and David Denemark. "Radicalism, protest votes and regionalism: Reform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onservative Party."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 no. 1 (2014): 3-26.

Schmitt, Carl, and Ellen Kennedy.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MIT press, 1988.

Schulzek, Nina. "The impact of welfare systems on immigration: An analysis of welfare magnets as a pull-factor for asylum seekers and labour migrants." *Migration Studies Unit*.

England: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England, working paper 2 (2012).

Stokes, Susan. 1999.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9. 2: 243-267.

Swank, Otto. 1998. "Partisan Policies,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Support."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2): 367-386.

Vadlamannati, Krishna Chaitanya, and Grace Kelly. Welfare Chauvinism? Refugee Flows and Electoral Support for Populist-right Parties in Industrial Democracies, MPRA Paper No. 81816,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2017.

Voorheis, John, Nolan McCarty, and Boris Shor. "Unequal incomes, ideology and gridlock: How rising inequality increase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2015).